



中国新文艺大系

1949—1966

曲艺集

中国文联出版社



# 中国新文艺大系

1949—1966

## 曲艺集

罗扬 主编

中国文联出版社

1990·北京

本分集主要编辑人员

主 编 罗 扬

主编助理 郝潭封 许光远

责任编辑 谢郁彦

中国新文艺大系

[1949 — 1966]

曲 艺 集

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隆昌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16开 44.75印张 6插页 898千字

1990年9月北京第1版 1990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ISBN7-5059-1286-0/J·335 (平) 定价: 21.90元

ISBN7-5059-1287-9/J·336 (精) 定价: 27.50元

# 中国新文艺大系总编辑委员会

总顾问 周扬

总主编 陈荒煤

副总主编 冯牧 李庚

总编委 陈荒煤 冯牧 赵寻

张庚 孔罗荪 王朝闻

李庚 江晓天 许觉民

《中国新文艺大系〔1949—1966〕》各分集主编

短篇小说集	葛 洛	戏剧集	张 庚
	刘 青	电影集	罗 军
中篇小说集	孔 荪	曲艺集	罗 扬
	朱 秦	音乐集	周 巍
诗 集	张 志	美术集	吴 作 人
散文集	吴 恒		刘 开 渠
	黄 耘		艾 中 信
杂 文 集	曾 彦	摄 影 集	陈 伯 萍
	秦 牧		徐 肖 冰
报告文学集	陶 白	舞 蹈 集	高 帆
儿童文学集	穆 青	书 法 集	游 惠 海
民间文学集	陈 模	评 论 集	沙 孟 海
少数民族文学集	贾 芝	理 论 史 料 集	冯 牧
	晓 雪		张 炯
	李 乔		

中国新文艺大系主要工作人员

编辑部成员	宋文郁	李景峰	陶国鎰
	邢 沅	郑荣来	
出版负责人	李 湜	陈树彬	方翕之
装帧设计	张慈中		

## 出版说明

(一) “五四”以来的中国新文化运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六十多年来，中国的新文艺取得了极其丰硕的成果。这些成果，深刻地反映了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各个历史时期中国人民的生活和斗争。它是本世纪中华民族所创造的宝贵的精神财富，是中华民族对于人类文化的巨大贡献。编纂一部反映“五四”以来中国新文艺优秀成果及其发展历程的拔萃本总集，目的是为继承和发扬革命传统、进一步繁荣我国的社会主义文艺事业，为研究、总结我国文学艺术的发展、衍变的规律和历史经验，提供一套比较系统、完整的资料。我们也期望这部总集，能帮助广大读者，在浩如烟海的出版物中选择精英，统览各个时期的优秀文艺作品，从中汲取教益；并能有助于世界各国人民了解中国和研究中国的新文艺，促进国际文化交流。

(二) 《中国新文艺大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编纂的指导思想，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遵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力求实事求是地、全面地反映我国新文艺在不同时期的历史概貌。

(三) 《中国新文艺大系》按历史时期分辑，由近及远地编纂出版。从“五四”运动前后到一九八二年底，共分五辑：第一辑〔1917—1927〕；第二辑〔1927—1937〕；第三辑〔1937—1949〕；第四辑〔1949—1966〕；第五辑〔1976—1982〕。若干年后，将续编以后的各辑。

《中国新文艺大系》每辑按文学艺术的门类和体裁分集，各辑的分集根

据不同历史时期的实际情况有所不同。所有分集均有主编撰写的导言。

(四) 这次出版的《中国新文艺大系〔1949—1966〕》为第四辑，共十九集。其理论部分包括评论集和理论史料集；文学部分包括短篇小说集、中篇小说集、诗集、散文集、杂文集、报告文学集（包括通讯、特写）、儿童文学集、民间文学集、少数民族文学集；艺术部分包括戏剧集（话剧、戏曲）、电影集、曲艺集、音乐集（声乐、器乐、歌剧）、美术集、摄影集、舞蹈集、书法集；优秀的长篇小说本辑不列分集，其目录由理论史料集收选。

本辑的编纂，仍然聘请著名专家、学者担任各分集的主编；仍然坚持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对十七年的作家、艺术家和他们的作品进行全面衡量，同时考虑某些作品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所具有的代表性，强调尊重历史、反映历史，强调质量第一，作到精选、严选、拔萃与代表性相统一，全面地反映新中国十七年文艺的概貌。

香港、澳门、台湾作家的作品，因资料不全，难于精确选拔，暂不收录，俟条件具备，另行增补。作品编排一般以首次发表时间或所据版本的时间为序，少数分集分类后再按时间先后排列。个别作品收入本书时，作者作了少量的文字改动或由编者订正讹错。

(五) 《中国新文艺大系》的编纂，是在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及中国新文艺大系总编辑委员会的领导下，依靠文艺界的大力支持、组织广泛的社会力量进行的。工作中我们还得到有关部门及海内外专家、读者的热情赞助，谨在此一并表示谢忱，并恳请惠予教正。

中国新文艺大系编辑部

一九八七年五月

# 导言

罗 扬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宣告了人民革命的胜利，我们的国家进入一个新纪元。我国的曲艺也随之获得解放，进入蓬勃发展的新时期。

曲艺，是我国人民喜闻乐见的说唱艺术，是中华民族文化艺术宝库中一个组成部分。各民族、各地区流传的曲艺品种近四百个，曲艺艺人遍及城镇乡村，历代都造就出许多有卓越成就的艺术家，他们所创造和积累的书目和曲目，难以数计，素称书山曲海；长期形成的艺术流派，多姿多采，宛若灿烂群星。曲艺来自人民，在人民的哺育中成长、发展。曲艺艺人出身寒苦，生活在旧社会的底层，了解和熟悉人民的生活、思想、感情和要求，以及他们的艺术欣赏习惯，因而，他们的说唱往往能够真实地反映人民的生活，道出人民的心声，引起人们心灵的共鸣。曲艺在人民文化生活中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曲艺对我国文学艺术的发展，特别是对小说、诗歌、戏曲、音乐的发展，也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然而，曲艺艺术和曲艺艺人同其他民间文学艺术和民间艺人一样，在封建时代，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地位低下，处境艰难。旧社会的统治者对于旧曲艺的态度是又利用，又侮辱；他们迷恋于旧内容的艺术，但是瞧不起民间艺人，总是百般侮辱民间艺人。受传统观念的影响，社会上也有许多人既喜欢曲艺，又轻视曲艺艺人，把他们看作“下九流”。广大曲艺艺人散处在城镇乡村，收入微薄，饥寒交迫；曲艺的发展也是很困难很曲折的。五四新文化蓬勃兴起之后，曲艺同其它民间文艺一样，开始受到一些进步文化人的重视。三十年代，以鲁迅为首的左翼作家曾经提倡过用说书唱本形式表现革命的新内容，并且创作出一批新说唱作品。可惜的是，在国民党反动



派的统治下，新说书唱本未能与艺人的演唱活动结合起来，形成真正的说唱活动，在群众中生根、开花、结果。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情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工农劳动人民当家做主，人民喜爱的文化艺术受到重视，曲艺如同枯木逢春，呈现出勃勃生机。在党的领导和关怀下，在革命战争年代的各个历史时期，各个革命根据地都进行了改造民间艺术和民间艺人的工作，涌现出许多表现新时代、新人物的曲艺作品，广大曲艺艺人为活跃革命根据地的文化生活、鼓舞人们争取民族解放和人民解放的斗争做出宝贵的贡献。王尊三、韩起祥等就是他们中间的优秀代表。在国民党统治区，有些曲艺艺人接受了进步思想的影响，也做出可喜的成绩，受到人们的赞扬。但是，大部分曲艺艺人仍然处于旧中国黑暗统治之下，过着奴隶般的日子，曲艺艺术处于自生自灭状态。解放前夕，宣扬封建迷信和低级庸俗的书曲充斥书台；新中国成立之后，曲艺界才得到解放，曲艺才获得新的生命，革命的进步的新曲艺才得以在全国范围和全体规模上迅速地发展起来。

1949年7月在北京举行的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揭开了建设新中国的人民文艺的序幕。曲艺工作者同其他文艺工作者一样，实现了各方面的大会师、大团结，一致表示要紧紧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团结在毛泽东文艺思想旗帜之下，把为人民服务首先为工农兵服务作为自己奋斗的方向。同时，成立了曲艺界自愿结合的全国性曲艺团体筹备组织——中国曲艺改进会筹备委员会，并积极开展发展新曲艺、改造旧曲艺的工作。可以说，这次代表大会为建设新中国的人民曲艺揭开了序幕。

新中国成立后的17年中，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胜利地完成了过渡时期的总任务，走上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取得辉煌的成就。党和人民政府为改革和发展曲艺艺术做了大量的工作。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他先后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推陈出新等重要方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布的《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周恩来、陈云等中央领导同志对曲艺工作的关心、支持和提出的许多指导性意见，以及各级党和人民政府为推动曲艺工作所采取的许多积极措施，对于广大曲艺工作者提高认识、增强团结、促进曲艺的改革和发展，都产生了极大的指导、推动和鼓舞作用。17年中，广大曲艺工作者以革命文艺工作者的标准要求自己，努力提高自己的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思想觉悟和文化艺术修养，深入人民

群众的火热斗争生活，创作和演出了许多富于时代精神、深受群众欢迎的好作品、好节目，并运用新的观点和方法，认真整理出许多优秀传统曲艺作品。同时，各民族、各地区都造就出一些优秀曲艺人才。特别值得称道的是，广大曲艺工作者继承和发扬了革命文艺工作的好传统，哪里需要曲艺就走到哪里，哪里最艰苦就走到哪里，从城镇到农村，从内地到边疆，从军营到战场，都踏遍了他们的足迹，洒下了他们的汗水，有的曲艺工作者，如常宝堃、程树棠等同志，甚至英勇献出了他们的宝贵生命。由于“左”的影响，由于文艺工作指导上的失误等原因，曲艺发展过程中也产生过一些偏差和问题，但是，曲艺工作的成绩是显著的。17年，在历史的长河中只是短短的一瞬间，然而在我国曲艺史上却留下划时代的光辉的一页。

## 二

曲艺是综合性的说唱艺术。在近四百个曲艺品种中，绝大多数是唱的和唱中有说或说中有唱的，如各种大鼓、坠子、琴书、弹词、清音等，由文学、表演、音乐三部分结合而成；有少数是只说不唱的，如北方评书、扬州评话、苏州评话等，由文学、表演两部分结合而成。此外，如相声等，则基本上是说的，由文学、表演两部分组成；也有说中带唱的，基本上是学唱，既有别于纯说的相声，亦有别于一般的演唱，可以说基本上是由文学、表演两部分组成，有音乐的成分。无论哪一类，说唱的底本（无论是口头的或文字的），都是曲艺演出的主要依据和进行艺术再创造的基础。凡属经久流传不衰、深受人们欢迎的曲（书）目，大都有较高的思想艺术价值的说唱底本。有了好的说唱底本，又有好的表演、好的音乐和唱腔，才能构成完整的艺术品，在听众中收到感心动耳、荡气回肠的艺术效果。因此，说唱文学创作的情况如何，对于曲艺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新中国成立后曲艺蓬勃发展的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曲艺创作日趋繁荣，涌现出许多好的和比较好的曲艺作品，特别是表现新时代、新人物的曲艺作品。

说书类曲艺，包括评书、评话和各种长篇鼓书、弹词等，形式自由灵活，表现力很强，无论是当代生活，还是历史故事，以及民间故事和神话传说等，都可以通过说书形式表现出来。根据内容和演出的需要，可以写成长篇，也可以写成中篇、短篇。在解放后的17年中，许多曲艺工作者运用评书、评话、

鼓书、弹词等形式创作、改编了许多作品，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我国著名作家赵树理，在小说创作方面做出卓越的贡献，在评书创作方面也创造出优异的成绩。他一向关心和重视曲艺。他认为，好的评书，就是能说的好小说；好的鼓词，就是能说唱的好诗。为了纠正社会上和文艺界某些人瞧不起曲艺的偏见，为了给曲艺演员提供一些好的曲艺作品，他虚心向艺人学习，带头写鼓词、写评书。短篇评书《登记》通过小飞娥的经历，深刻揭露了封建买办婚姻的野蛮性和旧习惯势力的顽固性，热情地歌颂了以艾艾、小晚为代表的一代新人争取自由解放的斗争，反映了两辈人在新旧两个时代的不同命运。故事情节并不复杂，却构思巧妙，跌宕有致，引人入胜，显示出作者对农村生活的深刻了解和过硬的艺术功力。这篇作品发表后很受读者欢迎，很快就被评书演员讲说出去，并先后被改编为鼓词、评弹以及多种戏曲上演。长篇评书《灵泉洞》（上部），真实地反映了太行山区人民对敌斗争的故事，着力塑造了田金虎这样一个从“傻大哥”在斗争中成长为精明强干的群众领袖式的人物，把日常生活写得波瀾起伏，娓娓动听，是一部好话本，也是一部好小说。著名评书演员陈荫荣曾把这部书讲说出去，很受听众欢迎。陈荫荣著文称赞赵树理“对评书的艺术技巧掌握得十分熟练，又没有受旧套的限制，没有拘泥，对评书的形式作了许多革新。”赵树理原计划继续写《灵泉洞》下部，由于种种原因，可惜没有写成。赵树理根据田间的长篇叙事诗《赶车传》改编的鼓词《石不烂赶车》，为改编工作提供了范例。他不是简单地以原作为骨架，将诗改为韵散相间的鼓词，而是认真分析原作，在尽量保持原作精华的前提下，运用自己的生活体验和艺术技巧以及鼓词这种艺术形式所特有的表现手法，加以调整、增删和创造，使故事情节的发展更加合情合理，生活气息更加浓厚，矛盾冲突更加尖锐，人物形象更加鲜明，主题思想更加深化；韵文部分，写得形象、生动、精炼、上口，是能唱的诗；散文部分，写得简明、风趣、活泼，有抒情味和节奏感，象散文诗。这部作品发表后，曾由著名西河大鼓演员马增芬、北京琴书演员关学曾等演唱，并在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播出，听众反映很好，文艺界人士肖三、罗常培等也交口称赞。

有些热爱曲艺艺术的作家也运用评书、故事、评弹等形式创作了一些曲艺作品。马烽的短篇评书《周支队大闹平川》，写的是八路军护送干部过封锁沟

的故事，文笔朴素、生动，情节发展巧妙、自然，把通讯员周小泉勇敢、机智的形象和我抗日军民英勇斗争的画面真实地呈现在人们面前，具有很强的艺术魅力。刘流的《烈火金刚》，是新中国成立后出现的第一部长篇评书。作者是抗日战争的参加者，熟悉抗日军民的生活和斗争，也熟悉我国传统小说话本艺术，所写场景有声有色，人物形象鲜明，故事曲折动人，而且便于讲说。这部作品出版后，赢得广大读者的欢迎；同时，很快为评书演员所采用。范乃仲一生致力于评书的创新。所写《小技术员战服神仙手》，反映了农业生产中先进与保守的思想斗争，小技术员和“神仙手”这两个人物都写得很生动，特别是小技术员这个人物，不但有理想，有追求，而且有科学头脑，能把先进的科学技术与生产实际结合起来，可以说是一个有典型意义的新人形象。作品生活气息浓厚，语言新鲜活泼，从内容到艺术形式都给人以新的感觉。陶钝的《三件棉袄》，吴桐的《一锅稀饭》，朱仙斌的《冷枪战》等，也都各具特色。

作家与演员合作，或由演员自己动手写书，同样取得许多可喜的成果。以苏州评弹为例，解放后评弹界许多有识之士即致力于编演现代书。上海人民评弹团集体创作（唐耿良、左炫执笔）的中篇苏州弹词《一定要把淮河修好》，及时反映了淮河两岸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兴修水利的壮举，并穿插回叙了过去淮河泛滥给人民带来的严重灾难，新中国与旧中国，真是两种天地。柯蓝、蒋月泉、周云端创作（柯蓝执笔）的中篇苏州弹词《海上英雄》，以真实生动的故事，歌颂了我海军部队的英雄人物，给人以鼓舞和力量。上海人民评弹团集体创作（左炫整理）的中篇苏州弹词《王孝和》，生动地再现了革命烈士英勇不屈的光辉形象。这三部作品都是在演出实践过程中不断加工、提高而成的，很适合于演唱，在艺术形式上也有所突破，并创造了一个晚上演一个完整的故事的新形式。这三部作品有力地证明了评弹这种艺术形式经过推陈出新，完全能够表现新的时代、新的人物，获得预期的艺术效果，从而为以后新评弹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北方评书、鼓书演员所进行的创作改编工作，亦卓有成绩。王尊三和韩起祥，早在革命战争年代就是编演新书的能手。新中国成立后，他们继续积极从事曲艺创作和改编工作。王尊三改编的长篇鼓书《新儿女英雄传》、《说唱活人塘》和他创作的许多短篇鼓词，韩起祥创作的陕北说书《翻身记》，杨田荣等创作的短篇评书《小闯将》，田连元创作的短篇评书《追车



回电》等，内容是新的，艺术上也不同程度地有所创新。由于创作和改编者有丰富的演出实践经验，对曲艺研究有素，所写作品都具有说唱艺术的特色，很容易为曲艺演员所采用，对于推广新书起到积极的作用。此外，许多演员还把《三里湾》、《铁道游击队》、《林海雪原》、《青春之歌》、《红旗谱》、《红岩》等许多长篇小说改编为说唱作品，不断扩大了新书的阵地。可惜的是，这些作品未能记录下来，整理出版。

全国近四百个曲种中，唱的曲种居绝大多数。各种唱词创作的繁荣，对改变曲艺的演唱面貌，促进曲艺的改革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17年新唱词创作的成就，首先是思想内容上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表现新时代、新人物，成为唱词作家和写作者努力实践的方向，有些表现历史故事和民间传说的作品也被作家们赋以新意。其次，在艺术上也有新的创造。最明显的是，许多作品都摒弃了旧唱词中那些陈旧的、一般化的、缺乏表现力的语言，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经过提炼的群众语言，既符合演唱的需要，又提高了作品的文学性；同时，注意借鉴、吸收了姊妹艺术的一些新手法，在表现形式上进行了大胆的探索，创造了新的表现形式和艺术手法，为演员和音乐设计、伴奏人员提供了艺术再创造的可能性。反转过来，演员和音乐设计、伴奏人员的创造性劳动，也鼓舞了作家们的创作热情，促进了唱词创作的创新和繁荣。贾怀玉等创作的鼓词《考神婆》，乡土气息浓郁，通过巧妙的故事情节，生动的语言，有力地揭穿了封建迷信活动的欺骗性，具有强烈的讽刺效果，长期传唱，至今依然有着积极的作用。王明希的唱词《渔夫恨》，是抗美援朝运动开始时出现的优秀作品。作者以鸭绿江边渔村发生的故事为背景，真实地描绘出新中国成立后人民心情舒畅地进行和平劳动的美好景象，揭露了美帝国主义侵犯我国领空、到处狂轰滥炸、杀害我国人民的滔天罪行，表达了我国人民同仇敌忾的火热感情和保家卫国的坚强决心，语言生动流畅，结构完整，把唱词的可演性和可读性很好地结合起来，受到广大听众、读者和文艺界、曲艺界的好评，并被教育部编入初中语文课本。杨退龄的四川清音《党的好女儿》、重庆市曲艺团集体创作（张尚元等执笔）的四川清音《江竹筠》、王中一的京韵大鼓《韩英见娘》、王济的天津时调《红岩颂》、竹亦青的四川扬琴《黎明前的战斗》、李广武的岔曲《红军过草原》和夏史、一尘的苏州弹词开篇《饮马乌江河》等，都以炽热的感情和诗的语言歌颂了革命先烈和革命者的光

辉业绩以及他们的崇高革命精神，给听众、读者以鼓舞和激励的力量。王鸿的唱词《月夜荡泥船》把叙事、写情和抒情结合起来，生动地勾画出一幅农村劳动的新画面，给人喜悦，令人神往。陈寿荪、朱学颖的京韵大鼓《光荣的航行》和骆玉笙、朱学颖的京韵大鼓《珠峰红旗》，是两篇有代表性的鼓词作品。前者通过水兵为毛主席守卫的故事情节，抒发了人们对毛主席的崇敬和热爱之情，感情真挚，景色瑰丽，色调明朗，气氛欢快，感人至深；后者以昂扬的热情，激越的声调，颂扬了我国体育健儿们不畏艰险、勇攀高峰的英雄气概。这两篇作品在艺术上则熔铸传统鼓词和现代语言于一炉，既有浓烈的京韵味，又能给人以新的感觉，而且都经过著名京韵大鼓艺术家骆玉笙的演唱，在音乐、唱腔和表演上作了较大的改革和创新，真正做到内容与形式的统一，珠联璧合，相映生辉，至今传唱不衰。王亚平的唱词《张羽煮海》是作者在曲艺创作方面的代表作。作者是我国著名诗人，长期致力于诗歌的民族化、大众化，并写过不少曲艺作品。他在《张羽煮海》这篇作品中运用诗的语言技巧于唱词，成功地塑造出琼莲的美好形象，歌颂了她和恋人的坚贞纯洁的爱情，以及他们争取婚姻自由的勇敢精神。写的虽是神话故事，却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作品写出后，新华社曾全文播发，全国许多报刊同时刊载，在文艺界和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作者还将这篇作品改编为戏曲上演。王亚平和王尊三改编的《孟姜女》，也是唱词创作中的一篇重要作品。作者在尽可能多地占有材料的基础上，精心构思，在作品中突出地表现了孟姜女的善良、美好而又坚强的性格和她同万喜良的忠贞不渝的爱情。作者对千百万劳动者寄予深切的同情。人们读过这篇作品会深深感到，万里长城这一伟大工程是以多少勤劳、善良的人们的痛苦和血汗作为代价！这篇作品在艺术上也采用了一些新的手法，可供人们从事唱词创作的借鉴。如果说赵树理是热心曲艺并在曲艺创作方面做出显著成绩的一位小说家，那么，王亚平则是热心曲艺并在曲艺创作方面做出显著成绩的一位诗人。

相声、谐剧、独角戏等，都具有风趣、幽默的特点，被人们称为笑的艺术，在17年中获得很大的发展，相声创作的成就尤为显著。许多相声作品都发挥了讽刺的特长，起到揭露敌人、针贬时弊和教育人民、娱乐人民的积极作用。讽刺敌对势力的作品，如侯宝林、孙玉奎的《一贯害人道》，就写得相当成功。作品对反动会道门坑害群众的罪恶行为的揭露和鞭挞，不是靠说

教，而是通过相声特有的艺术手段；“包袱”组织安排得巧妙而自然，既在人们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每个“包袱”都“抖”得很响。作者又是著名的相声表演艺术家，经过他们的演出，作品显得更有光彩，更能收到很好的社会效果。揭露人民内部矛盾和讽刺社会上种种不正之风的相声作品也相继问世，比如何迟的《买猴儿》，胡允立、林涵表的《戏改神手》，陈长馨的《王金龙的祝英台》，郎德沅等的《夜行记》，以及周柏春、朱翔飞的独角戏《全体会》等，都具有较高的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何迟的《买猴儿》，更为脍炙人口。这篇作品生动地描写出一个工作上“马马虎虎”、生活上“大大咧咧”、作风上“嘻嘻哈哈”的“马大哈”形象，揭露了“马大哈”式的人物如何与官僚主义相结合给党和人民造成的严重危害，夸张而不荒诞，尖锐而又有分寸，切中时弊，引人深思；艺术上也使人感到新颖别致。这篇作品由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马三立等演出后，风行全国，“马大哈”成为老少皆知的典型人物，许多人都从“马大哈”这面镜子中看到类似的人物或照见自己的影子。何迟还写过其它一些讽刺人民内部落后现象的作品。不幸的是，许多作者在这方面所做的努力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鼓励，象何迟这样的曲艺作家还被错误地划为右派，受到极不公正的待遇；有些好的和比较好的作品也遭到禁锢，不能继续演出。这就给相声艺术的发展带来极为不利的影响。

相声能不能歌颂？有些相声作者、演员进行了探索和试验，并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果。马季、赵世忠的《英雄小八路》，马季的《找舅舅》，夏雨田的《女队长》，李凤琪的《追车》和陈健民、宛玉波的《万紫千红绕营房》等，都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新中国的新人新事新面貌，使人感到欢畅，受到鼓舞，证明相声不但长于讽刺，也能够歌颂，从而为相声艺术的发展开拓了新路。此外，赵忠、常宝华、钟艺兵的《昨天》，则将歌颂与讽刺交织在一起，新旧社会对比鲜明，构思独具匠心，“包袱”含蓄，发人深思。

快书、快板创作空前活跃。山东快书，解放前原名“武老二”，主要是说武松故事，创作方面的积累不多，从业人员也较少，但在解放后，特别是在部队中，却有了迅速的发展。以著名山东快书表演艺术家高元钧为代表走在这支队伍的前头，他带领他的学生和晚辈们，积极投入抗美援朝的火热斗争，深入部队和人民生活，创作和演出了许多优秀作品。王桂山、刘学智的《一车高粱米》，以敌我双方兵力穿插交错的特定战争环境为背景，选取我人

民志愿军运输兵夜送高粱米而误入敌占区的特定事件，通过一系列扣人心弦的故事情节，生动地塑造出我军战士机智勇敢的光辉形象，辛辣有力地嘲笑了美国侵略者，故事紧张、曲折，构思独特、巧妙，语言风趣、活泼，是山东快书创作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品，也是高元钧等一批表演艺术家经常演出的保留节目，对促进山东快书创作，扩大山东快书艺术的影响，起到重要的作用。李二、刘学智的《三只鸡》，也是抗美援朝运动中涌现出来的一篇有代表性的好作品。作者通过张大娘为志愿军巧计杀鸡的故事，表现了情同骨肉的军民关系，生动活泼，亲切感人。高元钧等的《师长帮厨》，生动地描绘出我军一位新任师长的感人事迹和亲如手足的官兵关系。作者使用了误会和巧合的情节，却又使人感到真实而自然。高元钧、刘洪滨、刘学智的《长空激战》，运用刚劲有力的语言，为人们描绘出一场空中激战的情景，有声有色，动人心魄，大长了我军的志气，大灭了敌人的威风。用山东快书表现空中激战是不容易的，能写得这样动人，是很可贵的。陈增智的《李三宝比武》是《李三宝传》系列作品中最早的一篇，热情地描写了一位刺杀功夫高强又善于帮助别人好班长形象，情节紧张、生动，刻画细腻，耐人寻味。

在快板创作方面有成就的作者也不少。革命战争年代被誉为快板诗人的毕革飞，在新中国成立后继续写出了不少快板作品。快板书演员李润杰，不仅在表演艺术的改革创新方面有显著成绩，在创作上也取得不少优秀成果。《劫刑车》和《抗洪凯歌》都写得气势磅礴，有声有色。前者成功地塑造出双枪老太婆的英雄形象，不但写出曲折动人的故事，而且写出人物的性格和内心世界，感人至深。后者真实地表现出天津市党政军民团结奋起抗洪的动人情景和坚强意志，给人以亲临其境、亲闻其声之感，看到李润杰的演出，都会受到极大的鼓舞。朱光斗也是编演快板的能手。《学雷锋》构思新颖，通过两位战友争夸雷锋、同雷锋一步步接近的手法，一层比一层深刻地揭示出雷锋崇高的思想境界，在艺术上也很好地发挥了对口快板风趣活泼的特色。《巧遇好八连》则在“巧”字上下功夫，用“巧”字把整个故事贯穿起来，使人们随着“巧”字发出的笑声，自然而然地进入作品的艺术境界，受到感染和教育。农民诗人王老九的快板作品，巧妙地运用了民歌的语言和艺术手法，别具风格。他创作的《进北京》，以诗的语言，抒发了他进北京的喜悦心情，展现了首都建设的新面貌。



我国是个多民族国家，在50多个少数民族中，大都拥有自己的曲艺艺术，风格独特，丰富多采，是我国曲艺宝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新中国成立以后，各地都涌现出一些有成就的少数民族曲艺家，创造出许多深受群众欢迎的曲艺作品，真实地表现了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设社会主义新生活的壮丽图景，歌颂了各条战线的新人新事，表现了少数民族的光辉历史和优良传统，唱出了各族人民的共同心声。巴杰的好来宝《两只羊羔》，毛依罕的好来宝《铁牯牛》，道尔吉、乌苏格博彦、纳·赛因朝克图的好来宝《富饶的查干湖》，哈斯朝鲁、巴达马仁沁的好来宝《夸马》，杨汉的大本曲《大理好风光》，黑明星的大本曲《画眉展翅》，笑弦、晓风、激流的僮族唱师《新风赞》等，就是其中一部分译成汉文的好作品。

### 三

新中国成立后的17年间，曲艺创作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也有不少深刻的教训，认真地实事求是地加以分析研究，对于促进社会主义曲艺的繁荣和发展，是十分有益的和必要的。

方向问题，是根本的问题，首要的问题。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早就明确指出，我们的文艺要为人民大众服务，首先要为工农兵服务，号召文艺工作者与新的时代的群众相结合，通过文艺作品告诉人们“新的人物，新的世界”，使人民惊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进一步阐明了社会主义文艺的方向。17年的曲艺创作和整个曲艺工作为什么能够取得鼓舞人心的成就？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因为广大曲艺工作者在党的正确文艺方向指引和鼓舞下，做出了艰苦的努力。正因为如此，我们的新曲艺才成为我国社会主义文艺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在人民文化生活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受到党和人民群众的重视和欢迎。在方向问题的认识和艺术实践上也有一些教训。其中一条重要教训，就是把为工农兵服务同为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分割开来，以致创作的路子不是越来越宽，而是越来越窄，影响了社会主义曲艺的全面发展和繁荣。

人民生活，是文艺创作的唯一的源泉。为了获得这样的源泉，许多曲艺作家和曲艺工作者都积极投入人民群众的生活和斗争中去，观察、体验、分析、研究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